

百人百部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历史复杂性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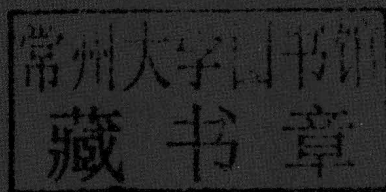
白利鹏/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百人百部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历史复杂性的观念



白利鹏/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复杂性的观念/白利鹏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ISBN 978 - 7 - 5482 - 0915 - 7

I. ①历… II. ①白… III. ①历史哲学—研究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2746 号

责任编辑：段义珍 柴 伟

装帧设计：刘 雨 王睿韬

责任印制：张爱成

书 名	历史复杂性的观念
作 者	白利鹏 著
出 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650091）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650034）
电 话	0871 - 5031071 5033244 0871 - 4113185
网 址	http: //www. ynup. com www. ynp-ph. com. cn
E - mail	market@ ynup. com rmszbs@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 75
字 数	241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0915 - 7
定 价	40. 00 元



雲南文庫

《云南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李纪恒 张田欣 高峰

副主任委员：钱恒义 尹欣 陈秋生 张瑞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展飞 任佳 汤汉清 何耀华 张勇

张昌山 杨毅 范建华 贺圣达

《云南文库·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编委会

主任委员：张田欣 王义明 高峰

副主任委员：尹欣 刘德强 张瑞才 张红苹 张云松 范建华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光 王清华 叶文 刘大伟 江克 任佳 西捷 汪戎

李兵 李炎 李昆声 李生森 杨先明 杨福泉 杨安兴 陈一之

陈云东 陈路 陈平 何明 何晓晖 张桥贵 吴卫民 吴宝璋

和少英 周平 周永坤 和丽峰 金丽霞 武建国 欧黎明 郑晓云

郑海 胡海彦 段万春 段炳昌 郝朴宁 施惟达 柴伟 崔运武

董云川 韩跃红 蒋亚兵 雷翁团 靳昆萍 戴世平

主编：范建华

副主编：江克 蒋亚兵

作者小传

白利鹏，男，蒙古族，1968年5月出生于黑龙江省鹤岗市。哲学博士，现任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主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和当代复杂性理论及复杂性思想范式等方面理论，并力图对近代以来形成的历史规律性范式有所反思和超越。在《哲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昆明理工大学“伍达观杰出教师奖”和“红云优秀教师奖”，以及吉林大学“优秀毕业博士研究生”、昆明理工大学首届“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治学信条：哲学是一种没有广阔视野就没有思考深度的事业——我思故我在。

《云南文库》编辑说明

《云南文库》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编辑出版《云南文库》是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重要举措，是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是树立云南文化形象、提升云南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有共性，还有很强的地域性。一国有一国之学术，一方有一方之学术。学术研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智慧的结晶，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虽地处边疆，仍不乏丰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尤其明清以来，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日臻密切，省外名宿大儒进入云南的代不乏人，而云南的文人学士也多有游宦中原者。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云南的文化学术遂结出累累硕果，文化名人辈出，如杨慎、李贽、李元阳、师范、王崧、方玉润、许印芳等，其总体集中性的代表成果是《滇系》和《云南备征志》。至清末，云南学子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留学，成为云南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改造社会和推进云南文化学术发展的中坚。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云南的学术成果并未为内地所认知。更有甚者，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在全国征集历代遗书，云南巡抚李右江得到云南先贤的著述，但害怕其中有什么不恰当的内容，竟私藏起来不上报，使得《四库全书》仅从它处收录了3种云南人著述，成为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辛亥革命后，云南学人痛感地方文化学术之不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由云龙、周钟岳、李根源、方树梅、秦光玉等一批当时最负盛名的云南学者倾力收集整理云南文献，于1914年至1923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初编，共152种1064卷，及不分卷者47册；1923年至1940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二编，共69种133卷。另编定31种待刻，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云南丛书》的编辑刻印工作中止。历时26年编刻的《云南丛书》把保存下来的历代云南重要地方文献网罗殆尽，是云南有史以来地方文化的一次最系统的总结，对云南的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学术创新的根基是学术积淀和传承。从编辑刻印《云南丛书》之

时算起至今，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云南的学者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为云南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今天，文化建设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整理和出版云南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优秀成果，是继承优秀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站在前人的肩上，我们才看得更远，走得更实。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云南文库》的初衷。

比之编刻《云南丛书》的时代，云南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不再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边疆省份，而是成为了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云南的文化创造力也大大发展了，学者力量的壮大、学术成果的丰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云南文库》不可能像当年《云南丛书》一样收录所有的文献资料，只可能是好中选优、优中选精，尽可能地把最能体现云南学术文化水平和云南学术特色的成果收录进来，以达到整理、总结、展示、交流和传承文化，弘扬学术，促进今日云南文化学术的建设与繁荣之目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云南文库》分为三个系列。

一是《云南文库·学术大家文丛》，收录云南学术大家的作品。

二是《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出生的云南学术名家的作品。

三是《云南文库·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的优秀作品。

我们将使《云南文库》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不断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云南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云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2011年6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历史哲学关注人“类”的命运	1
第二节 人类的命运就是历史复杂性	6
第三节 锁定历史复杂性——历史哲学的主题回归与问题转换	11
第四节 重读哲学的“历史哲学化”理想	18
 第一章 思想对“复杂性”的自觉	27
第一节 复杂性科学浅论	27
第二节 思想对“复杂性”的自觉	35
第三节 根据自觉的“复杂性”观念反思以往理论思维的前提	53
 第二章 历史复杂性观念的提出	79
第一节 历史的观念片论	79
第二节 “家族相似”——可能存在的简单化倾向和简单性特征	100
第三节 提出历史复杂性观念的基本根据	108

第三章 历史复杂性——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破缺性统一	126
第一节 人类历史的有序性	126
第二节 人类历史的无序性	145
第三节 统一性的破缺性——历史之有序性与无序性的复杂关系	169
结 语	213
参考文献	215
后 记	225



绪 论

对于人类之由远古走到今天，其间创造了多少辉煌灿烂的文明和文化，遭受了怎样深重的灾难与严重的挫折，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当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同时也积淀着深切的感受与深刻的领悟。“宗教信仰命运，文艺表达命运，哲学思索命运。”^①对于历史哲学而言，则尤其不能囿于种种感性或知性的满足，而必须通过广泛、深入的思考达到某种观念性的理解，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又或许是某种更深层次、更加根本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层面的历史思考在与一般哲学同样久远并且同样坎坷曲折的思想旅途当中，不断演绎着的某种夸父式的、西西弗斯式的悲壮神话，不仅是理解的，而且也是永远值得期许的；它所扛起的那种沉重与尊严，它所遭遇的种种困顿与无奈，确实不是将哲学归结为思想游戏或概念游戏的各种无根之论所能超脱的，同时也绝对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意识形态的阴谋”这样的说法所能消解的。

第一节 历史哲学关注人“类”的命运

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对于人类而言，最需要关注与关切的，恐怕就是其自身的历史命运。小到“渺渺如沧海之一粟”的普通个人，大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某个民族或种族、某个国家或朝代、某种文明或文化以及某种社会运动或社会制度，都在以各种不可还原的方式实践着，同时也在完成着自己的命运，都在事实上为人类的历史存在充实着某种内容、创造着某种形式。但是，我们应该说，这些局部的命运还不等于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命运

^①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02页。

至少是一种整体性，即人类存在的整体上的可能性。

也许，我们在此考问自己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思及、论及“人类的命运”的时候，无论在内心之中缠绕着多少深刻的困惑与迷惘，搅动着多少深切的回顾与希冀，可是——我们究竟何指、目的何在、立场为何？在通常的意义上，“人类”仅仅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所有已经逝去、仍然健在和尚未出生的所有个人的总称。但是，我们能认为所有这些个人的所有遭遇统统都加起来——不论有多少的悲欢离合，也不管有怎样的生死沉浮——的总和，就等于人类的命运，就是历史哲学所要关注的吗？似乎不能。相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类的命运”这个问题作为问题的问题性，即其明确性、具体性、有效性和真实性其实已经到了无法认识、思考和把握的程度了。比如，我们看到报纸上有这样一个醒目的标题：

不足百只，东北虎命运堪忧！

在这里，“东北虎（的）命运”这样的说法（作为一个“能指”），显然不是指人工饲养或野生状态的每一只东北虎每天能否吃饱玩好、会否生病、会否遭到猎杀、会否失足跌下悬崖等这些具体事件的总和；虽然与这些内容有所关联，但更主要的则是指：作为猫科动物的一个赫赫有名的亚种的东北虎，其“种”的可延续性或延续的可能性，已经岌岌可危，使人忧虑。也就是说，东北虎作为一个整体，其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已经受到某种威胁，这种威胁对于每一只东北虎的存在都具有同样的根本性或彻底性，它意味着东北虎的威猛形象有可能最终变成某种凄凉而美丽的“传说”，成为某种纯粹符号性的“图腾”。类乎此，当我们论及“人类的命运”的时候，也只能是在如此这般“关切”的意义上来进行思考或讨论的。

但是，人“类”生命的可延续性是否受到威胁、是否成为问题了呢？这似乎很难回答。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值得期望的：人类毕竟是人类，它大概不会沦落到像野生东北虎那样“种群数量不足一百”的时候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命运——亡羊补牢，往往为时已晚！在这个意义上讲，东北虎或许又还是比较幸运的，尽管“虎种危机”主要是由人类活动所造成，但其命运毕竟还有人类来加以关心或关注；人类的命运由谁来关怀或关切呢？大概只能是



人类自己。

但是，正如曼海姆所说，“只有个体才能够思维，这是千真万确的”^①。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尽管人类当中的每一分子都是有感情、有思想并且也比较懂得关心自己的命运的，但是，人类作为一个“类”，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它如何关心自己的命运呢？看来，只能由某些个人代表或代替整个人类来进行思考。但是，这也同样存在问题：第一，我们无法保证人类当中的任何一分子自始至终都会像关心他自己的命运一样来关心人类的命运。第二，他能否达到人类的高度、具备人类的视野，他能否超出个人、家庭、阶级、民族、种族、意识形态和文明、文化等各种偏见来看问题，也同样值得怀疑。第三，即使他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但他的思考或结论能够得到时刻都怀有前述各种偏见的人们或全人类的理解、认同与实践吗？至少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现实的可能性。也许，这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世界历史”的人类历史才刚露端倪，人类还远远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历史或者休戚与共的现实关切或者高度协同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是由于类似“虎种危机”那样的紧急情况或历史遭遇似乎还非常微渺和遥远，而其能否真的发生还充满无穷的变数。就世界范围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触目所及的几乎都是个人之间、集团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它们是如此普遍、如此“必然”、如此激烈，以至于所有关于“人类命运”的话题都常常沦为杞人忧天式的笑柄。也许，康德认为必须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来思考人类的历史，其根本宗旨或深层忧虑也正在于此；也可以说，如果古希腊的第欧根尼（他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自觉地以“世界公民”自命的哲人；而在当今时代，如果没有世界性、人类性的眼光，能否作为哲人，或许应当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能够重生于当代，恐怕只有他才是思考人类命运的最佳人选。

也许，上述分析失之于偏颇、抽象或笼统，但似乎不是没有任何意义，其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人类的命运”如果能够作为一个问题存在，它所指向或针对的并不是所有个人的人生际遇的算术和，而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原始初民时期的人类

① [德]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华夏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 页。

能否存在，主要是由大自然来决定的，对此，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都提供了很多可靠的证据或根据；人类发展到今天，则已如杨魁森所指出的：“随着自然世界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和越来越深刻的程度上转化为属人世界，人实际上已经生活在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之中，而人类生存的主要矛盾，也转移到人同自己的活动及产物的矛盾关系上。人类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生存’危机，而是怎样解决由人自己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性危机，‘生存’危机的实质在于社会，人类的‘麻烦’源于自己。”^①正如我们在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洪流当中所看到的：无数生命的旋涡在奔涌、咆哮、冲击、挤压、碰撞、吸纳、融合、破碎、汇聚、重组；其能量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在哪里崩岸，在何处改道，是否会断流，都主要是由人类自己决定的；其形态是如此的波诡云谲，以至于人类所有的语言都难以描摹，所有的思维方式或思想工具都相形见绌、捉襟见肘。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将反思的目光和焦距对准人类的整体，在人类自身的整体性当中寻求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可能性。

指向人类自身，不是指向超越历史的抽象的人类共性或“类本质”，而是指向人类整体上的复杂生态或人类关系总体上的复杂形态。正是这种复杂生态或复杂形态决定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可能性。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社会历史运动是最高级、最复杂的现象。那么，我们似乎也有理由认为：人类的命运之所以可以被称为命运，也就是在于它作为一个整体的过往经历、现实遭遇与未来走向的复杂性，这同时也就直接地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不可认识、不可把握、不可筹划、不可预定的性质和特征。命运是不可捉摸和琢磨的，但又是真正的思考所必须关注和关切的，对于人类命运的这种性质和特征，那些指向终点的、终极性的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争论与争执，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关键在于，必须承认“现在”、“当下”的人类对于自己的“无知”以及对于这种“无知的无知”一直就是其主观世界的严峻现实，从来都是如此，在历史存在的每一点上、在创造历史的每一时刻，都是如此。“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老子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

① 杨魁森：《哲学就是生活观》，《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3期。

也。”（孔子语）苏格拉底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这些古老的智慧很难说在今天没有被各种学科式的认识与研究的表面繁荣所遮蔽；尤其可悲、可叹的是，哲学本身也变成了一门学科或“科学”，历史哲学则沦为它的一个“分支”或者部门；而人类自身的命运——这个在任何时候都因其复杂而沉重、因其沉重而复杂的话题和问题，则被堂而皇之并且暗度陈仓地肢解为各种知性的图示或图例，被人们几乎是“彻底地”、不加任何反思地遗忘了。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① 在时间维度上的开展与延续。历史固然是由人来创造的，但这种创造无论是在本能的意义上还是在自觉的意义上，或者在本能与自觉之间的某种意义上，都与那种“全知、全能”式的认识与实践——严格而言，这只是一种普遍而真切的思想幻觉——不能同日而语。人类是时间之维当中的有限存在；但恰恰是在时间这个维度上，人类毕竟不是并且永远不能“进化”为神仙或者上帝。在鼓励“创造”、欢呼“创造”、拼命“创造”、不得不“创造”的同时，这种“创造”的本身及其其所具有的形式和内容，是否具有先验的合理性、是否需要反思？是否所有的“创造”都必然地增进人类存在的可能性即人类历史的可延续性？进而言之，尤其是近代以来，认识意义上和实践意义上的、双重的盲目自信乃至自负已经不是一种无关痛痒的浮泛之念，已经根深蒂固地渗透、充斥和弥漫到人类精神的各个角落，已经直接构成了人类命运的一种血肉相连、难以割舍的内在成分；而反思的声音则微乎其微，一次又一次地被急功近利的、孟浪浮躁的众声喧哗所淹没。应该说，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惨烈确实唤醒了对于人类命运的某种忧患意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挥之不去的、现实的核战（这是当今人类“自杀”、“自我毁灭”的最有效方式；就其有效性而言，确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进步”）威胁和“人口膨胀”、“资源、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灾难”、“南北差距”等全球性问题的突然涌现，则使这种忧患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在某种程度上讲，韦伯对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辨析、海德格尔对于“在者之在”的沉思、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异化的批判、汤因比对于“全教会”时代的渴望、科林伍德关于史学有可能教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人类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说等，都可以看做是一种基于忧患意识的思想表达或哲学表达，我们不难从中领悟到一种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深刻忧虑与深沉期待。这种忧虑与期待，绝对不是杞人忧天的“小资”情调或者知识分子的胆怯与懦弱，而恰恰体现了一种深沉的哲学理性和长远的历史眼光，体现了一种思想本身的勇气、智慧和责任感。

第二节 人类的命运就是历史复杂性

如果说人类的思想使命主要是由哲学来承担或践履的话，那么，历史哲学必须将人类的命运作为自己真正的甚至唯一的主题。但是，什么才是人类的命运呢？在我们看来，人类的命运既不是某种历史必然性，也不是所有的历史必然性，它压根儿就不能仅仅从必然性出发、仅仅用必然性来理解和解释。然而，确定历史必然性、寻求历史规律性恰恰构成了从维柯以来的、包括“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实证的”历史哲学在内的几乎所有本体论层面的历史哲学思考的基本思路 and 主导倾向。应该说，众多的历史—哲学思考不是没有看到历史偶然性的存在，但是它们仍然试图将种种历史偶然性纳入某种必然性的解释模式当中加以消解、归纳、控制和整理，于是包括历史动力、方向、目的在内的各种历史模式才应运而生，为历史哲学范围内的种种独断论提供某种在思维的技术层面不可或缺的保证和前景。在这些解释模式当中，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性的具体形态尽管差异悬殊，但是必然性或规律性在解释能力方面的优越性或优先地位是不容置疑并且显而易见的，而历史偶然性往往是作为无关紧要的历史现象、作为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而被边缘化、被省略、被删除和处理掉了的。这样理解的人类命运，或多或少都具有某种宿命论的嫌疑，都具有某种简单化的、一相情愿的性质或痕迹。

命运意识或命运问题比哲学、比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更加古老，其实，它从诞生之初就充满复杂性的意蕴，而不仅仅是某种必然性。“在古希腊哲学开始出现时……荷马的英雄诗篇，赫西俄德关于诸神谱系的故事已经流传了 300



年。”^① 我们看到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或《荷马史诗》当中的诸位英雄都是既抗争命运又创造命运的；从著名的悲剧英雄普罗米修斯到在狩猎当中被野猪撞死的美少年阿多尼斯（爱神阿佛罗狄忒的悲剧情人），包括“众神领袖”宙斯在内的“他们”所承当和实现的命运，已经不是不可移易的铁一般的纯粹必然性了，而是和各自的性格逻辑、主观选择、“神际”或人际（社会）交往的偶然性嵌套和缠绕在一起的；作为艺术的或某种意义上也是历史的形象，是复杂性成就了他们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之所以具有某种感人的力量，也正是由于其表达了人们对于自己命运的困惑与关切。尽管那时的命运意识还是以一种感性的、直观的、非自觉的方式存在的，但其内容与今天我们思考自己的命运时的困境一样沉重、深广、难以捉摸和言说。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认为，由于那时人类、命运、历史诸概念还没有获得比较普遍的称谓和相对稳定、具体的含义，尤其是复杂性思想还没有达到哲学的、观念层面的自觉（这大体上属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他们的命运的复杂性就是可以简单对待的或者完全可以厘清的。

在哲学诞生以后，命运意识或命运问题逐步获得了某种明确性，也就是某种具体的问题性。苏格拉底的“人的转向”、柏拉图对于古希腊城邦制度的考察、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自不待言，即使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也并非出于纯粹、孤立的对于自然世界的好奇心理，而仍然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②。我们很难设想，泰勒斯关于万物“始基”的想法没有任何社会、伦理、风俗、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反思背景和现实针对性（例如可能就是对于迷信、巫术所具有的非自觉性的反拨，用罗素的话说，“尝试一种新东西”）；同时我们却有理由认为，其潜在的解释目的也完全可以是人类本身。一般而言，古希腊时“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借用高清海的说法）在观念上是“以‘笼统、直观’的方式混沌地统一在一起的，所以解释了自然的来由当然

①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②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页。